

朱锐：从容面对死亡的哲学家

“我曾经是一个男孩，女孩，一株灌木丛，一只鸟，
还有跃出海面的、沉默的鱼。”

——恩培多克勒

朱老师在生命的最后朗读了恩培多克勒的这首诗，强调“沉默”是指没有语言的，又指出恩培多克勒是跳火山死亡，这是对其思想“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的践行。朱老师继续讲述自己的猜测，也许恩培多克勒获得了涅槃与重生。对于恩培多克勒而言，生命最终回归于世界的起源，便是重生。朱老师也践行着自己的哲学，并用自己的行动不断充实自己的生命哲学与死亡哲学，这是哲学家之间的默契。

朱老师热衷于登山，喜欢探险，在野外有许多次与死亡照面的经历。但这些“被动”的经历还不足够，朱老师还会主动进行“死亡练习”。在《西方哲学原典》课上，朱老师在讲《杀死一只知更鸟》时，指出对有色人种的隔离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是被社会培养起来的恐惧。小孩子最初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而不是嫌恶、恐惧，乃至进一步地排斥和驱逐。讲到这里，朱老师神采奕奕地讲到自己在美国求学时主动要求住在“鬼屋”的经历，并用苏格拉底的名言“哲学就是练习死亡”，就是“恐惧恐惧”，也就是战胜对死亡的恐惧，来总结结合自己的经历所做的生动而鲜活的讲述。

朱老师不仅讲述自己或主动或被动的“死亡练习”，还分享了普鲁姆伍德(Val Plumwood)在野外面对鳄鱼的濒死经验以及幸免于鳄鱼之口后对这次经历的思考。普鲁姆伍德在鳄鱼的注视中，意识到人不是别的，只是鳄鱼能够大快朵颐的事物。在人类社会中，我们自视甚高，以为人类凭借心智、意识而远高于动物界，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例外，人以其他动物为食，却不能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然而，“鳄鱼之眼”将人赋予自身的全部神圣性、例外状况剥除，将人以赤裸裸的食物的

生命的变形

雷沐春



朱锐在课堂上

形态出现在鳄鱼面前，揭示出人也是食物链上的一环。这是从食物的角度、从自然界生命与死亡的循环出发，来讲述人的死亡。

对这一现象，朱老师有一个简明易懂的总结：“我们生他者之死，死他者之生。”生命的个体可能消亡，但旧的个体恰恰能够滋养新的生命个体，促进新的生命个体的出现，这便是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循环。讲到相关“恶”的内容，朱老师会十分释然地提到“有机堆肥”，说自己喜欢以这样的方式处理遗体，能够最大程度地回馈自然。朱老师总是如此坦诚地、以轻松的口吻做出郑重的承诺，他在课堂上的讲述，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生命感悟。

朱老师对“鳄鱼之眼”还有更多的阐发，将其称作“第四非人称视角”。第四非人称视角是指脱离个体性的、更加宏大的视角，但又不同于上帝的无视角。第四非人称视角从个体视角外部出发，又指向特定的个体。普鲁姆伍德面对鳄鱼这一庞然大物的注视时，意识到鳄鱼的视角来自于一个自身之外的、更加宏大的物体，这个视角是指向自己的，这个视

角使得普鲁姆伍德意识到自己和鳄鱼都是食物链中的一环。这一得到扩展的概念，使得我们不必有普鲁姆伍德一般的濒死体验，就能思考人类在自然、宇宙中的脆弱与渺小。朱老师又用Nasa的“旅行者1号”分离太阳系时，回望地球拍下的照片来说明“第四非人称视角”。朱老师指出，这一回望十分耗能，但这一回望却揭示出地球在宇宙中宛如尘埃，更何况地球上的人们呢？

朱老师不仅从生物的角度讲生命与死亡的转变，还在课上反复谈及庄子对生命与死亡的理解。庄子强调“一气流行”，生命个体不过是一气流行中的暂时状态，不可避免地要进入新的“物化”阶段。在这一流动不止的过程中，所有的生命“方生方死，方死复生”（《庄子·齐物论》）。这与基于生物层面的说明殊途同归，个体的生命是暂时的，但生命的循环生生不息，当个体生命融入“大化”，便脱离暂时性而生生不息。

正是在那堂课上，我提到了王国维“自杀”的问题，谈到他或许是受到老子“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

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十三章）的影响才做出这样的选择。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十分冗长的叙述，朱老师闭目倾听，听罢，站起身来，讲述身体的区分，指出我们不仅有物质性的身体，还有社会身体。很多人自杀，也许是厌恶社会身体，却将物质性身体视作阻碍。实际上，按照朱老师对生命与死亡的理解，以过度的医疗手段维持身体或过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都是违背自然“大化”的行动。但朱老师并不排斥讨论相关的问题，正如朱老师所言：学生可以在他的课上畅所欲言。他喜欢倾听，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就会错失向学生学习的机会。

谈及生命，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身体。从身体出发谈论生命与死亡，也与朱老师生病的经历有关。朱老师告诉我们：人在健康的时候，身体是用来“使用的”，往往处于意识的背景中，一个健康的人不需要在走路的时候思考先迈哪条腿，不需要在起床时思考先动身体的哪个部位。但这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轻而易举的日常琐事在他生病之后必须刻意而为，必须思考自己在起床时先动哪里才能减少疼痛，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十几分钟。说罢，朱老师拄着登山杖，调整自己的身体，尝试从椅子上站立起身。在教室中踱步时，朱老师说道：就像刚才那样，站立起身这个动作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必须思考如何组织自己的身体。这是身体的突显。除此之外，在医院中目睹的病人的身体，也让朱老师以非常赤裸、直接的方式面对“人首先作为身体存在”这一事实，在日常生活中，这一事实往往被“社会身份”或“社会人格”所掩盖。

也许朱老师的离开仅仅意味着作为个体生命的结束，却是回归到法身之中，回归到自然的大化流行之中，为新的生命形态做好准备。这一次，朱老师也许会如愿化作“一只跃出海面的、沉默的鱼”，在海中悠然自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专业在读博士

从“小我”到“大我”

赵海若

很多媒体问我：看到老师身患癌症仍然坚持上课，是一种什么感受？对我而言，说不上来什么很特殊的“情绪”，但我深刻领悟了一个道理。

朱老师一直想做到的事情，就是在承认“我”永远只是带有局限性的“我”，无法超出“我”的第一人称视角的事实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我”的视域，实现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就像他很喜欢的一位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所说的那样，从“我的主观视角”到“无我的客观视角”的延伸，当然，后者并非一种科学的视角(毕竟科学实验也是带有预先的视角和方法的)，而是一种无视角的视角。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和我们对话时反复强调要“求真”，要“为社会做贡献”，而不要让“小我的欲望”束缚住自己，要从不断的阅读、做学问中获得巨大的快乐。

我想，这也是朱老师为什么能克服病痛，坚持上课、指导学生的原因。最开始听老师说到需要服大量的止痛片，但在课堂上，包括在平时打电话指导我们论文时，剧烈疼痛还是会时不时袭击他，我的内心是震撼且难以理解的。疼痛来袭时是非常痛苦、难以忍受的，我在去年的牙齿手术后经历了一次比较剧烈的术后疼痛，那一晚几乎无法入睡，止痛药效果不大，疼到眼泪无法抑制地往下

流。我尝试了无数疏解疼痛的方式，打游戏、看电影、刷视频……平时能填充无聊时间的无数娱乐，竟然对疼痛没有丝毫缓解。而老师所经历的疼痛，一定比我那一次术后疼痛的程度要重得多，当时我什么都做不了，他却能笑着讲课。

但如果把老师不断求真、追寻“大我”的精神和这件事联系起来，我似乎就可以理解了。日常的娱乐只能获得“小快乐”，打发时间、短暂欢愉没有问题，但无法和巨大的痛苦抗衡，只有想老师所说的那种追求真理、奉献自己、照亮他人的“大快乐”，才能克服万难。每次回忆起老师在课堂上明亮的双眼，在语音电话里有力的声音，让我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能有信心和勇气继续走下去。

追求更大的快乐，这种快乐近乎于最高的理想信念，这种快乐让我们在面对恐惧和痛苦时，能够任由它们



病床上的朱锐

穿过身体，坚定地做我想做的事情。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2022级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